学术专论

18—19世纪漠南和漠北蒙古草原史著的历史书写

——以正统史观及其变迁为中心

张光耀

[摘要] 18—19世纪漠南和漠北蒙古草原史著的历史书写与清代政治，特别是满蒙关系变迁密切相关。相较于17世纪蒙古编年史，它受藏传佛教及藏史学的影响减弱，而受内地文化、史学的影响显著增强；其"成吉思汗—忽必烈统系正统"史观松动，而偏重于持相对宽泛化的"黄金家族正统"史观，且这两种史观与佛教王权观，又均明显弱化。与史观紧密相关的文本主题、叙事、体裁、题材等，赓续编年史的同时也有相应变动，其对清朝的正统性则明确予以肯定。其历史书写及变动也反映了蒙古人的国家认同持续增强及清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深入发展。

[关键词] 18—19世纪 漠南漠北蒙古草原史著 历史书写 正统史观 国家认同

[中图分类号] K2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587（2024）－02－0115－12

17世纪蒙古草原的史著（学界称之为17世纪蒙古编年史，下文简称"编年史"）均出现于漠南和漠北，[①] 史学界对之已有较多研究。[②] 于此基础上，笔者将相关观点概述如下。[③] 编年史继承成书于蒙元时期的《元朝秘史》（简称《秘史》）传统，又受藏传佛教及藏史学深刻影响。其正统史观包含"汗权佛授观"与"成吉思汗—忽必烈统系正统观"。正统史观下，汗统神圣、汗权至上及政教二道（并行）是编年史的主题。其体裁、题材、叙事，与正统史观和主题又密切相关。其中的叙事，主要模式一是"正统"大汗与"他者"二元对立的结构模式，一是"听信谗言"与"复仇"的情节模式；特征则是传统叙事法与佛教社会历史观结合，文学色彩、审美

[收稿日期] 2022-10-03
[作者简介] 张光耀（1983— ），男，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曲阜273165，zgyxz10@126.com

① 编年史主要有以下几部，佚名：《阿勒坦汗传》；佚名：《黄金史纲》；佚名：《黄史》；萨冈彻辰：《蒙古源流》；善巴：《阿萨喇克其史》；罗藏丹津：《蒙古黄金史》。其多无署名，成书年份也多不确切。署名的作者基本分属两大群体，一是成吉思汗—忽必烈—达延汗后裔，一是喇嘛学者（或兼具前者身份）。

② 希都日古：《17世纪蒙古编年史与蒙古文书档案研究》，辽宁民族出版社，2006年；沙·比拉：《蒙古史学史十三世纪—十七世纪》，陈弘法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③ 张光耀：《蒙古历史书写与清代政治》，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22年，第77-78页。

维度及其与英雄史观结合，史事与诗歌、传说、寓言及神话糅合。而在后金—清朝呈席卷整个漠南、漠北蒙古之势下，[①] 编年史家强调“成吉思汗—忽必烈统系”的正统性，并与“汗权佛授观”及“印藏蒙王统同源论”（简称“同源论”）结合，一方面不无固化已经或即将被统一于清廷的“黄金家族”成员现实地位之用意，[②] 另一方面也包含了于意识形态上凝聚众蒙古，抵御、抗衡后金—清朝的动因，总体反映了他们对满洲既有认同的一面，又有排拒的一面。不过，其并未直接否定清朝的正统性，且总体讲一定程度上也表示了对清朝的认同。

18—19 世纪的蒙古草原史著包括漠南、漠北草原史著与卫拉特草原史著两部分，[③] 这两部分同源而异流。18—19 世纪漠南、漠北草原史著（为便于叙述，简称“文本”）是清代蒙古草原史著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历史书写深刻反映了满蒙关系乃至清代政治的变迁，以及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演进轨迹。[④] 但总体上，前人极少对其做专门、系统之研究，更少将其与满蒙关系以至清代政治等联系起来探讨，将这些置于和编年史对比视角下的讨论，更是付之阙如。本文则以编年史及相关史实为参照，探究文本的蒙古历史书写及其变迁，以及其与满蒙关系乃至清代政治之演化等的内在关联。

一、文本概况与历史背景

（一）文本概况

与编年史相较，文本的数量增加，且基本附有作者信息和成书年份，反映出这一时期漠南和漠北草原史学已趋于成熟。作者仍然包括两大群体，一为蒙古王公贵族，一为喇嘛学者，或同时具有这两种身份。相关作者与清廷的关系更显紧密，他们中的很多人除拥有清廷爵位外，还出任清廷官员。其文化水平相对更高，不少是博学多才的著名学者。此时的作者主要集中在漠南蒙古，史著成书时间则集中于雍正至道光朝。详情参阅表 1。

表 1　主要文本及其相关信息

史著	作者	身世	籍贯	成书年代	满蒙关系
《恒河之流》	衮布扎布	达延汗后裔，清朝辅国公、皇族姻亲，曾任理藩院教官，著名学者	乌珠穆沁右翼旗	雍正三年（1725）	清军平青海“罗卜藏丹津之乱”后两年
《金轮千辐》	答理麻·固什	喇嘛学者	扎鲁特右旗	乾隆四年（1739）	清准协议停战期
《大蒙古国根本黄金史》（简称《根本黄金史》）	罗布桑丹毕坚赞	哈撒儿后裔，乌拉特王公的后代，著名喇嘛学者	乌拉特前旗	乾隆三十年（1765）	乾隆帝已完成大一统
《水晶珠》	拉喜彭斯克	达延汗后裔，扎萨克协理三等台吉	巴林右旗	乾隆三十九年—四十年（1774—1775）	土尔扈特蒙古已回归
《金鬘》	衮布旺札勒	固山贝子	阿巴哈纳尔左翼旗	嘉庆二十二年（1817）	

① 本文依据建州女真—后金—清的发展阶段予以相应称谓，或以满洲概称其某些抑或整个阶段。一些时候，行文里对“清代”的相关问题之论述，也牵涉建州兴起至清朝建立这一时期，主要是后金时期。

② 研究者对“黄金家族”所指之认识不尽相同，本文则指代成吉思汗与其兄弟以及他们的后裔。

③ 清代蒙古，大概而言，按地域可分为漠南蒙古、漠北蒙古、漠西蒙古（又称卫拉特蒙古）。按清廷与蒙古的统属关系，其又可分为外藩蒙古、内属蒙古、八旗蒙古，八旗蒙古已非典型的蒙古民族，因此，本文草原史著的作者，仅包括外藩蒙古及内属蒙古之人——主要是前者。文中，蒙古历史书写里的“蒙古”，则概指全部的蒙古民族及其先祖。

④ 20 世纪初的漠南和漠北草原史著数量很少，且与 18—19 世纪的总体书写特征一致。

（续表）

史著	作者	身世	籍贯	成书年代	满蒙关系
《蒙古佛教史》（藏文写成，并译为蒙文）	固始噶居巴·洛桑泽培	喇嘛学者	土默特右旗	嘉庆二十四年（1819）	蒙古从征新疆，叛乱头目张格尔败亡
《蒙古政教史》	耶喜巴勒登	喇嘛学者	鄂尔多斯左翼前旗	道光十五年（1835）	
《宝贝念珠》	戈拉登	达延汗后裔，协理台吉	喀尔喀后路左翼后旗	道光二十一年（1841）	鸦片战争期间，蒙古从征
《水晶鉴》	金巴道尔吉	喇嘛学者	乌拉特中旗	道光二年—二十九年（1822—1849）	
《蒙古青史》	佚名	不明	当在漠南或漠北蒙古，详情不明	道光、咸丰年间（1821—1861）	

注：《蒙古青史》作者的籍贯根据文本书写特征等推定；相关文本的成书年代，有多种说法和不确定的，或学界普遍接受的说法，或记大概年代。

资料来源：包文汉等编著：《蒙文历史文献概述》，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4 年；薄音湖主编：《蒙古学百科全书（古代史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 年；沙·比拉：《蒙古史学史》（十三世纪—十七世纪）。

（二）历史背景

1. 蒙古及其与清廷关系之变迁

清朝在 17 世纪后半叶对漠南蒙古的统治更为牢固，在 17 世纪末又统一了漠北。康熙帝平定噶尔丹后，青海蒙古再次投顺清朝；雍正时期，清廷平定“罗卜藏丹津之乱”，确立了对青海的直接统治。乾隆帝又统一了天山南北。土尔扈特部东归后，相关蒙古民族已基本都纳入清朝统治之下。

18—19 世纪，漠南蒙古与漠北蒙古的变迁及它们与清廷关系之演变，基本一致，其中又以漠南蒙古及其与清廷关系之演化最为典型，下文主要以其为参照论述之。

在这两个世纪里，清廷在蒙地继续推行盟旗制度、军府制，扶植藏传佛教，并在总体上与蒙古上层仍保持亲善关系。同时，该时期满蒙关系及蒙古社会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对蒙地，清廷持续分散、削夺其上层权势，强化中央集权。蒙旗越分越小，清廷治蒙机构官员的权力持续增大，对蒙古的统治也日益深入。

清朝完成大一统后，蒙古的重要性降低，乾隆帝在对其恩威并用的同时偏于用威，并被之后的清帝所继承。从乾隆中叶开始，清朝国力渐衰，财政状况每况愈下，蒙古上层所受优待亦因之降低。这些难免又会导致蒙古上层对清廷产生一定程度的离心。近代以降，在列强的觊觎与渗透下，清廷对蒙古的统治也潜伏着危机。不过直至清季，除 1911 年外蒙古在沙俄支持下一度宣布“独立”外，清廷在总体上都对蒙古施以有力统治。

清末，清廷对蒙古的放垦、移民政策及新政，对蒙古的游牧经济、民族格局、工商业、城市化及社会生活、思想文化等的影响极为深远。而 18—19 世纪，蒙地最深刻的变化则是贵族官僚化持续发展，封建化加深，内地化及与内地的一体化加速。

2. 内地文化及史学的影响

以往研究清代蒙古草原史著编纂的学者，基本是讨论藏传佛教及蒙古传统史学对它的影响，极少深入论述内地文化及史学对其影响。文本持续受传统史学、藏传佛教及藏史学影响，不过较编年史，藏地因素总体弱化。编年史也受内地史学影响，但多是间接的，且表现不显著；在蒙古内地化及一体化深入发展下，文本则受到了汉族及满洲史学乃至文化之重要影响——满洲当

时已深度“汉化”，很大程度上又是以满洲学到的汉文化对蒙古史学施以影响的。[①] 文本受内地因素的影响主要包含如下几方面：

首先，其史源，除蒙、藏史著外，更显著的是来自汉籍（包括以满、蒙文翻译了的汉籍），[②] 特别是《元史》《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这样大量载录蒙古史的文献——其中又最受清朝官修蒙古史影响。《恒河之流》所载元帝部分即以《元史》为最主要的史源，而该文本又是其他文本的重要史源之一。其次，汉籍等内地因素也影响了其题材，促使它更多地载录了与内地相关的历史。丘处机是著名的全真教道长，应成吉思汗之邀远赴西域，讲养生之道，借机劝其“止杀”。在编年史里很难见到对他的记载，但文本却多述此人。[③] 在内地历史编纂学等影响下，其对编年史的一些说法也发出质疑之声，《恒河之流》即指出五色四夷国之说大约为传记杜撰。[④]

更为深刻的是，内地的史源和文化影响了文本的史观。最突出的则是其表现出了浓郁的儒家思想及内地的其他思想文化和价值观——这在编年史里难以见到。《根本黄金史》即包含“礼”等思想。[⑤]《水晶珠》称：“大元帝国一统天下”，[⑥] 则反映了“大一统”思想。

二、文本的主题与叙事之赓衍

与编年史及《秘史》相较，文本在主题及与之相关的叙事等上，既有继承，也有大的变化。

（一）主题的赓衍

文本之主题变化较大，除延续编年史汗统神圣、汗权至上、政教二道的主题外，还包括与这些相关联的满蒙关系。

汗统、汗权方面依然为文本的核心主题，但其所表述的它们的来源、内涵却发生了变动。如前文所论，这一时期满蒙关系及蒙古社会在延续 17 世纪情状的同时发生了深刻变化。另则，蒙古上层已不再唯成吉思汗直系后裔最尊，“黄金家族”旁系哈萨尔的后裔科尔沁贵族的地位即愈加凸显。在此情形下，文本汗统神圣与汗权至上主题的根本依据，主要由“佛”转回为“长生天”——前者把蒙古汗 / 皇统与印藏王统及佛祖世系相连，后者则更具普适性；“成吉思汗—忽必烈统系正统”史观同时也受到了冲击，而侧重表述范围扩大了的更早时期即已形成的“黄金家族正统”史观。尤为重要的是，其汗 / 皇统与汗 / 皇权所涉主体也有变化，除蒙古大汗外，还包括满洲君主，后者甚至更为重要；在此之下，“成吉思汗—忽必烈统系正统”及“黄金家族正统”史观又均弱化。与这一变化相关的“清朝正统”史观，可以说占有主导地位——而与正统史观相关的变动，也多具有主导趋势。

大部分文本仍宣示政教二道，同时文本的这一主题总体上也已弱化。文本的相关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第一，减少了涉及佛教的宇宙观及社会历史观的论述，包括减少了对佛教传说的记载；第二，出现了《蒙古佛教史》《蒙古政教史》这类专题史著，而相关章节更多的只是记述佛教本身的史实，包括佛法传播、佛教在蒙弘传史，以及蒙古地区寺庙分布情状等。

编年史对满蒙关系史极少记载，而这却是文本的一个新主题。此更为直观地反映了现实满蒙关系与漠南和漠北草原史家正统史观等的演化。

编年史赓续《秘史》传统，所撰蒙古史著均为编年体。受传统影响，编年体仍是文本诸体

---

① 张光耀：《清代草原史著的蒙古史书写与国家认同——以藏地和内地因素影响及其变迁为视角》，《中国民族学》2022 年第 2 期。

② 藏史学也愈受内地史学影响，文本此时受到藏史著的影响，一部分即间接来自汉籍。

③ 衮布扎布：《恒河之流》，包力源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9 年，第 122 页。

④ 衮布扎布：《恒河之流》，第 120–121 页。

⑤ 罗布桑丹毕坚赞：《大蒙古国根本黄金史》，格日乐译注，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4 年，第 23 页。

⑥ 拉喜彭斯克：《水晶珠》，包额尔德木图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20 年，第 145 页。

裁之主流，但它们在编纂学上更趋完善，编排也更为灵活，而未过多地遵照严整的历史年代学顺序——此与文本“成吉思汗—忽必烈统系正统”乃至“黄金家族正统”史观的弱化又相关。受诸体兼备的内地历史编纂学等影响，此时其体裁又呈多样化，除编年体通史外，还包括传记、谱志、专题等体例的史著，按大的分类，主要属编年史及佛教专题史。此时其体裁更显著的变化是出现了章节等结构划分，文尾也附以跋文，介绍史著及作者的相关信息。内地史学在评、注等诸多方面对它也有影响，如《水晶珠》出现了史评的编撰形式，《恒河之流》开创了小字夹注法。而文本之体裁不仅反映了其历史编纂学，也折射了其主题及题材、叙事等的情形。

题材与主题的关系更为紧密，与编年史相较，文本的题材也出现了一些变化，主要包括以下几点。一、如前文所述，其关于佛教理论和史实的书写出现了重要变动。二、大部分文本仍记载了印藏蒙王统的传承，但不再详述印藏王统，对中原王朝史却较多记载。三、其记载最多的仍是蒙古历代大汗 / 皇帝生平史，但对其他谱系也有较编年史为多的记录，包括“黄金家族”旁系、成吉思汗拖雷外诸子、达延汗长子外诸子谱系及其他贵族世系，《金轮千辐》即较多论及成吉思汗前三子、诸弟、青海蒙古诸部、者勒蔑之谱系。四、特别是因汗统观变动及“蒙古民族共同体”意识增强，其对东、西蒙古战争的记载亦随之减少。五、它们对明代蒙古史的记录仍然最多，但较编年史对明清时期满蒙关系与清代蒙古史的记载显著增多。此外，《水晶鉴》又属典型的成书于清朝步入近代前后的文本，其还揭露了列强的对华侵略，表现出大的时代特征。

（二）叙事的赓衍

“正统”大汗与“他者”二元对立的叙事模式在文本里仍然存续。不过，与编年史相较，这一模式的表现已非十分显著。一些史著不再隐讳非成吉思汗—忽必烈后裔的称汗者，比如对哈萨尔后裔阿岱汗，[①] 以及卫拉特的也先为汗之史实作了记载，[②] 叙事上也不再把也先等置于与“正统”大汗对立的位置上。而满洲君主这一主体又相对更被置于叙事中的“正统”之位上。

编年史的“谗言”与“复仇”的情节模式受正统史观变化的直接影响较小，且契合蒙古草原史著文学化的叙事风格及蒙古社会为血亲等复仇的传统，因此它们在文本里得到了较多保留。比如其同样把东、西蒙古战争的起因归于卫拉特浩海太尉怂恿额勒伯克汗杀弟夺妻，汗弟之妻设计复仇，经连锁反应，致蒙古内讧。不过，也有史著指出额勒伯克汗杀弟也是因为素来就怀疑他，反映了这一模式的变动，而记载也更合乎情理。

编年史的叙事特征，在文本里也得到了体现，但这些特征在总体上也呈弱化之势，特别是其神话色彩减弱，更为质朴、理性。比如《金轮千辐》里的神话、寓言与传说即少了很多，并表现了尽力探求历史真相的精神。而结合前文所论，相关变动又当与内地文化及史学影响，以及汗统、汗权来源观演化等有关。

三、印藏蒙王统同源论的松动与天授汗权观的复活

（一）“佛”与“天”的纠葛：汗统来源

汗统起源问题关乎大汗谱系，也与汗权来源及其合法性根源相关。学界对文本的汗统来源论研究得不多，说法也不一。一些学者认为相关文本延续了编年史的“印藏蒙王统同源论”，也有学者认为其已经放弃“同源论”，即便同一位学者，相关说法也或有含糊、抵牾之处。汗统起源论是研究草原史著正统史观乃至满蒙关系及清代历史发展的一个关键，对此当进一步厘清。

本文认为，“同源论”在文本里得以存续的同时又出现了变动。蒙古人在17世纪前尊奉“汗

① 罗布桑丹毕坚赞：《大蒙古国根本黄金史》，第53页。

② 拉喜彭斯克：《水晶珠》，第357页。

权天（长生天，简称天）授”观,《秘史》亦将蒙古汗统来源泛化地追溯于“长生天”。编年史提出“同源论”，实质上基本将汗统源头归根于“佛”。17 世纪后期的《阿萨喇克其史》对“同源论”表示疑惑，不过未直接否定。大部分文本仍承续“同源论”，然而叙述却简略了很多，文本对该说的坚持整体上松动了许多。其对“同源论”的表述又带有双重性和模糊性——认可它的同时又表露出怀疑，所归位的汗统起源则在“佛”和“长生天”之间不无含混、矛盾之处。但总体讲，其主要又重新将蒙古汗统溯源于“长生天”——特别突出了成吉思汗“感光而生”的十世祖孛端察儿及其后裔为“长生天之子”。[①]《恒河之流》即较典型地反映了“同源论”之松动及将汗统归源于“长生天”的倾向。[②]

此时的“同源论”及汗统起源论何以会如此？ 18—19 世纪，藏传佛教在蒙古持续发展，文本的部分作者也为藏传佛教教徒，其史源也包含编年史及藏地文献，在此情况下，它们中的多数保留了“同源论”——当然，其坚持该说也是为了以之表明蒙古汗统之正统性。而现有的研究成果基本又把“同源论”出现变化的原因归于清廷的政治压力，或所谓的满蒙政教中心建立情况的变化。[③] 笔者大致认可这些说法，同时认为个中缘由并非仅是如此，而包括相关联的多个方面。

蒙古草原史学相对于汉、藏等史学，在体系构建等方面并不算完善。文本受内地文化及史学影响，叙事理性、严谨了很多，存在宗教色彩的“同源论”则受此冲击。更为重要的是，结合前文所论，编年史家提出“同源论”的动因包括抗衡后金—清朝；而 18—19 世纪，蒙古社会与满蒙关系有了重要变化，文本作者对清朝的正统性则有更多认同，“同源论”即随之变化——若坚守“同源论”并以之论证蒙古大汗的正统性即会与清朝统治者形成对立之势，且清帝在蒙、藏还被称为文殊菩萨化身。

此外，一部分文本出现了“满蒙同源”一类的说法，其“同源论”则相应弱化。建州女真兴起后，在对外交往中曾一度模糊满蒙界限，植入“满蒙同源”的想象,[④] 编年史提出“同源论”也是为了以之划定与满洲的界限，保护蒙古民族及其文化、政治的独立性。18—19 世纪，满洲统治者已不再宣扬“满蒙同源”说，而将注意力更集中于以藏传佛教建构满蒙宗教文化的一体性，以拉近二者距离，进而牢固掌控蒙古。但其之前“满蒙同源”一类的说辞，以及蒙古民族本身对“满蒙同源”的想象，在满蒙关系深入发展等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文本作者却产生了持续影响。

（二）汗权“佛授”还是“天授”

汗权来源与汗统来源紧密相关，后者出现变化，前者自当有相应之变动。实际也是如此——尽管由于两个问题存在相对独立性，以及整个问题的复杂性，二者变化的幅度、节奏等具体情况不尽一致。

与“同源论”出现变动一致，文本的汗权观在保留编年史说法的同时也发生了变化。汗权观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汗权来源——汗权是来源于“长生天”，还是来源于“佛”，抑或其他。编年史虽然保留了传统的“汗权天授”思想，但主要宣称的是“汗权佛授”。文本对汗权来源的论述出现了反转——保留一定的“汗权佛授”思想，[⑤] 而主要宣示“汗权天授”。

就“汗权天授”观而言，文本与编年史也非完全一样。编年史的“天”很大程度上指“佛”之“天”。文本所言之“天”的基本内涵则是蒙古传统的萨满教的“长生天”，而且，其叙述与

---

① 拉喜彭斯克：《水晶珠》，第 9 页。

② 衮布扎布：《恒河之流》，第 5–8 页。

③ 林士铉：《清代蒙古与满洲政治文化》，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系，2009 年，第 226 页。

④ 努尔哈赤即曾对朝鲜说他是蒙古遗种。另参见《顺治帝为敦促政体归一颁给土谢图汗之敕谕》，顺治元年十二月初五日，内秘书院满文敕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2–01–05。其载顺治帝即对土谢图汗曰：吾等戴红缨之国“自古为一体”。

⑤ 草原史家在保留“汗权佛授”情形下，“化身”等佛教王权观也得到一些保留。

“佛”相关联的“天”（“佛天”）时，也多融入了“长生天”之意。另一层面，文本“汗权天授”之“天”（长生天）的意涵，也受到了内地的“天”之含义的影响。“天”是汉文化根源性的思想，得“天命”也是中原王朝论证其正统性的终极依据。汉文化的“天”“天命”思想融自然性、宗教神秘性、人伦道德性等于一体。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把“理”或“天理”作为宇宙之本体，“天”在宋明理学中即等同于“天理”，而更具道德性及哲学意涵。蒙汉民族的相关观念自是不同，但因渊源上的相关性、相似性，以及蒙汉民族长期接触等，蒙古“长生天”的含义与内地“天”的观念也存在相似甚或相通之处，包括都兼具宗教神秘性与人文性等。① 随着清廷对大漠南北统治及汉蒙交流的深化，文本更受内地“天”的观念影响，如下文论及的相关表述更凸显了“道德”及“人事”。满洲传统宗教亦为萨满教，虽与蒙古萨满教不尽相同，但同样“崇天”。满蒙关系密切，文本“天”（长生天）的含义也难免多受满洲影响。而这一时期，满洲于思想文化上持续深度“汉化”，其“天”的思想则又是深受内地文化影响。

此外，参照编年史，文本在汗统来源观上保留了更多的“同源论”，汗权来源观的变化则相对更大，传统的“汗权天授”观基本得以“复活”，原因又何在？本文认为，漠南和漠北草原史著的核心史观是正统史观，其汗统观与汗权观变化的实质是正统史观的变化，而相较于汗统观，汗权观与正统史观的关系更为直接、紧密——汗统观归根到底也是服务于汗权观及正统史观，因此在正统史观变化下其变动也更显著。而其汗权来源观及正统史观等的变迁，也折射了其清朝认同情况的演进。

四、关于蒙元王朝时期的蒙古史的书写及其正统史观之赓衍

文本在对蒙元王朝史的书写上，其史观、义例等在继承编年史的传统之同时，也出现了较大变动。

（一）成吉思汗及大蒙古国汗统史

在对大蒙古国建立前后的历史书写里，成吉思汗依然是文本最重要的人物；但总体而言，对他的记载相对于之前的草原史著已减少很多。文本对他的书写也延续了编年史传统。它们基本上亦持“成吉思汗正统”史观，在藏传佛教及佛教王权观、政教二道观持续影响下，相关史著仍宣称他为转轮王等。在对他的叙事上，也较多沿用了编年史的方法，包括较普遍地运用“正统”大汗与“他者”二元对立的叙事模式；文学色彩较浓厚，并将史实与神话、寓言、传说杂糅。

文本对成吉思汗的记载也出现了较大变化。首先，对成吉思汗的书写融入了内地的政治文化、价值观等。成吉思汗是否识得蒙古文或其他文字等，传统文献没有记载，但可以推知他应当未受过文化教育。诸如《水晶珠》却很显突兀地借群臣之口说他“文武双全”。② 如前文所论，文本虽保留了佛教王权观，但变化很大；在论述成吉思汗的降生及其正统性上即又凸显出他为苍天之子。③ 特别重要的一点变动是，文本虽基本沿袭“成吉思汗正统”史观，④ 但出现了松动、弱化之倾向，哈萨尔后裔即在成吉思汗与哈萨尔关系史的书写中颠覆性地提高后者的历史地位。⑤ 最重要的原因又当是，随着蒙古的清朝认同大为增强，很多文本则不再过于抬高成吉思汗的地位。文本对成吉思汗的叙事也变得质朴和理性得多，而对相关神话、传说的记载明显减少，

---

① 刘小萌、定宜庄：《萨满教与东北民族》，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 年，第 36 页。

② 拉喜彭斯克：《水晶珠》，第 31 页。

③ 答理麻固什：《金轮千辐》，乔吉注，包额尔德木图、海英编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8 年，第 43–44 页。

④ 衮布扎布：《恒河之流》，第 16–17 页。

⑤ 罗布桑丹毕坚赞：《大蒙古国根本黄金史》，第 41–42 页。

甚或质疑。①

文本对大蒙古国其他人物的记载同编年史一致，仍相对很少。在仅有的记载里，文本或保留了编年史的说法，如很多史著同样把将藏传佛教引入蒙古的阔端书写为蒙古大汗。与编年史相较，更显著的是相关书写之变化。文本在“忽必烈正统”史观出现变动（下文详述）的情况下，未再过于凸显忽必烈之父拖雷；对大蒙古国第二代大汗窝阔台则予以更多肯定，《蒙古佛教史》即说他“沉毅有谋略、贤明稳重，故父王加持为自己皇位之继承人”，② 而此说法也当更符合史实。此外，大蒙古国四杰中的博尔术与木华黎最受成吉思汗器重，编年史的相关书写详于前者而略于后者，但 18—19 世纪，由于后者与内地关系更密切——占据中原的金国的大部分土地是他所征得——及内地因素影响等，文本对其载录明显增多。

（二）细化下的元朝皇统史

编年史对元朝史记载极少。在内地史学、文化深入影响，对内地王朝的认同增强，以及满蒙关系发展等情形下，文本对元朝史的记录则明显增多。

皇权至上依然是文本元朝史书写的一个主题，不过，由于其清朝认同的增强，以及元、清两朝同为非汉民族建立的大一统政权而存在潜在的对比等，其“忽必烈正统”史观受到一定冲击。《水晶珠》即道“不能说宪宗可汗确有让忽必烈承袭可汗的意愿”，此乃宪宗皇后之意。③ 而忽必烈称汗的合法性也确有问题，兹不赘述。

政教二道及佛教社会历史观在文本关于元朝史的书写里仍有遗存，同时亦有变化。编年史认为忽必烈行政教二道而元兴，元顺帝不行政教二道而元亡，一些文本依然把元顺帝的亡国之因归于不奉政教二道；但《水晶珠》即又说他面对农民军起义的境况，“放宽一切，视同太平无事之时一样”，④ 这也当是受汉籍影响，而更接近史实。

编年史为宣扬政道二教等，对元朝史仅有的书写聚焦于忽必烈和元顺帝，文本除了多记述二帝，在政教二道主题弱化及对内地王朝认同增强等情况下，也较多载录了其他的元帝，同时与编年史一致，仍予以他们以更多的肯定。比如，泰定帝亡，元廷发生帝位之争，文宗被拥立后宣称替远处的兄长明宗和世㻋守位，待其来而让之，二人在中都（今张北）相会后，和世㻋暴亡，史家普遍认为文宗难脱干系，《水晶珠》却认为“一些人却以恶意的猜想加弥天大罪于文宗”，因文宗之位又传于和世㻋后裔，还“应该嘉奖文宗可汗与皇后的忠信仁义之举”。⑤

与编年史有异，文本在对元帝多予肯定的同时也指出了其问题。比如《水晶珠》在肯定忽必烈治国能力等的同时认为他“在用人方面亦有过错”，并指明“一般认为，世祖晚年变昏君，多为奸臣恶贼蒙蔽所至……这种误用人才，有其自己治国之道”，⑥ 而这类评述也表现了作者客观、求实的史学精神。此外，文本对元臣也有较多记载，《水晶珠》即肯定“伯颜在一统中原的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⑦ 未因欲凸显元帝而隐没其功，这类记载在编年史里是难见到的。

① 拉喜彭斯克：《水晶珠》，第 79 页。
② 固始噶居巴 · 洛桑泽培：《蒙古佛教史》，陈庆英、乌力吉译注，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 年，第 11 页。
③ 拉喜彭斯克：《水晶珠》，第 110-111 页。
④ 拉喜彭斯克：《水晶珠》，第 321 页。
⑤ 拉喜彭斯克：《水晶珠》，第 263、279 页。
⑥ 拉喜彭斯克：《水晶珠》，第 171、183-184 页。
⑦ 拉喜彭斯克：《水晶珠》，第 192 页。

五、正统史观变动下的明清蒙古史之书写

（一）明代蒙古史

1. 明蒙关系

文本对明蒙关系的载录较编年史为多，且在继承后者相关书法的同时出现了变化。为凸显元朝的正统性，与编年史一样，文本多采信“朱葛传说”，把朱元璋书写成背叛了元顺帝的元朝旧臣，[①] 并使用“谗言”等叙事模式，且多预言、神话等。不过，以《水晶珠》为例，其虽仍说朱元璋为元旧臣，但与编年史不同，曰其生于姓朱的老头家里是“在我们蒙古文史记中”，又参考了《续资治通鉴》等汉籍，并多记录了朱元璋起兵渡江及攻取大都的经过等，还独称他之外的农民军为“贼寇”。[②]《蒙古政教史》还指出明朝的国号为“大明”，元顺帝北奔后是“仅仅管辖蒙古地区的可汗”；其子“以后之二十一汗为仅管辖蒙古之小汗”。[③] 而对元明鼎革史及明代蒙古史书写的变化，[④] 也都反映了文本对包括明朝在内的内地政权及其正统性的认同倾向。

很多文本仍保存编年史的“永乐帝为元顺帝遗腹子说”，同时也或有变化，包括对该说之质疑。[⑤] 而保留该说又应与蒙古相关民间传说的存续相关，不过，更重要的无疑还是为了证明永乐帝以降的明帝都是元裔。同时，该说也体现了文本对编年史“复仇”叙事模式的继承。至于明英宗被蒙古所俘之事，文本也做了记载。与编年史相较突出的变化则是，它们总体上未再多写明蒙战争及凸显明为蒙古之宿敌，《金轮千辐》还称因瓦剌太师们折磨了英宗等，“瓦剌民众与牲畜遭到了灾祸与磨难”。[⑥] 这又反映了文本的明朝认同倾向。此一方面是因为其清朝认同的增强，而明朝与清朝一样，同为内地王朝；一方面是因为该时汉蒙关系发展，而这又折射了清代政治、民族关系之演进。

2. 蒙古民族及东西蒙古关系

文本对明代蒙古民族及东西蒙古关系史的书写，更为直接地反映了“成吉思汗—忽必烈统系正统”史观受到了冲击。与编年史不同，文本对女性摄政者多作了记录。比如《恒河之流》指明达延汗是由满都海拥立登上合罕大位，统一了分裂已久的大蒙古。[⑦] 文本也多载明了非成吉思汗—忽必烈嫡裔的称汗者。尤有甚者，别里古台为成吉思汗异母弟，其后裔毛里孩扶立莫伦可汗，后杀害之，《水晶珠》却认为“但他又扶立了满都固理可汗。这对维护成吉思汗黄金家族以及元朝的汗统传承做出了贡献”，[⑧]《根本黄金史》还称毛里孩做了可汗。[⑨] 另一方面，文本在关于明代东蒙古史的书写上——包括大汗与东蒙古异姓贵族关系史，对正统“大汗”与“他者”二元对立叙事模式的运用也较编年史为少，在叙事上亦更为客观、严谨。

文本对西蒙古及东西蒙古关系史的载录，在继承编年史的同时，也有较大变化。文本仍认为西蒙古厄鲁特、辉特等部首领源出于成吉思汗先祖朵奔篾儿干之兄都娃锁豁儿，[⑩] 此说虽谬，

---

① 固始噶居巴 · 洛桑泽培：《蒙古佛教史》，第 14–15 页。

② 拉喜彭斯克：《水晶珠》，第 341、321、320 页。

③ 耶喜巴勒登：《蒙古政教史》，苏鲁格译注，民族出版社，1989 年，第 19、21 页。

④ 明代蒙古主要分鞑靼部和瓦剌部，此外还包括兀良哈三卫等，瓦剌逐渐迁徙至漠西，又称西蒙古，鞑靼部及三卫则称东蒙古。

⑤ 拉喜彭斯克：《水晶珠》，第 345 页。

⑥ 答理麻固什：《金轮千辐》，第 120 页。

⑦ 衮布扎布：《恒河之流》，第 69 页。

⑧ 拉喜彭斯克：《水晶珠》，第 364 页。按，满都固理可汗不是由毛里孩扶立。

⑨ 罗布桑丹毕坚赞：《大蒙古国根本黄金史》，第 56 页。

⑩ 耶喜巴勒登：《蒙古政教史》，第 28–29 页。

却反映了其对东西蒙古统治者同源的判断。而且，文本还载录了关于西蒙古绰罗斯、土尔扈特部起源及世系的相关说法。《蒙古政教史》提出“据说卫藏的一部分人，移居后方，繁衍为土尔扈特”，① 一定程度反映了“蒙藏同源”思想，这又当是“同源论”的变体。与编年史迥异的则是，文本未多渲染东西蒙古之间的矛盾，此又反映了文本对东西蒙古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的认同，以及清代政治及蒙古民族的发展。

与编年史相同，文本基本还秉持“东蒙古正统”史观。比如达延汗只是统一了东蒙古六万户，西蒙古实际上是独立的，《水晶珠》为凸显东蒙古的正统地位，却载达延汗统治了“全蒙古（指东蒙古——引者注）和卫拉特”。② 又如《金轮千辐》也记载了脱欢欲称汗而遭天谴，在八白室被成吉思汗箭囊飞出之箭射中。③ 另一方面，其“东蒙古正统”史观又出现了很大变化。《蒙古政教史》则载蒙古大汗里，“孛儿只斤姓氏三十五汗，卫喇特二汗”，④ 而这样的书写在编年史里是难以见到的。

（二）清代蒙古民族及其与后金—清朝关系史

从书写的朝代这一维度讲，与编年史相较，文本最显著的变化是对清代蒙古史的书写，包括相关载录的大幅增长。而对清代蒙古史的书写也集中反映了其正统史观的变化。编年史坚守“黄金家族正统”特别是“成吉思汗—忽必烈统系正统”史观，未多表述对清朝正统性的肯定——即便作者所在部落已受清统辖。文本则在主流上认同清朝的正统性。⑤ 下面主要依次从其对清代满蒙关系、蒙古民族、清帝三个层面的历史书写论证这一结论。

察哈尔汗为达延汗以降蒙古的正统大汗。编年史对察哈尔末代大汗林丹汗及其与满洲的关系史记录甚少，对林丹汗也未明显责难。但文本的相关记载很多，对察哈尔败亡的评述也与编年史不太一样，不再讳言“蒙地之政权失落于女真人”，⑥ 而记述了察哈尔败亡于清。很多文本对林丹汗还提出批评，《水晶珠》即说他“沉湎于寻欢作乐，从而政法懈怠，赋税过重，人民叫苦”。⑦ 对林丹汗西迁欲征西藏，文本也更多地作了记述，且否定之，《蒙古政教史》即载其“邪魔入心，率众离住地而去”，西征蒙古右翼，“企图入主青海，联合藏巴汗废格鲁派”。⑧ 当然，诸文本对相关史实的述论也有差异之处，比如《蒙古青史》则肯定了他的“扶持圣教”、翻译佛经；又认为他因“一时心迷”西征右翼，“请走成吉思汗的金身圣座”，并企图废除格鲁派。⑨

文本对林丹汗后裔降后金及“布尔尼之变”也作了较详细的记录。内地正统论里，传国玺是得“天命”及王朝正统性的重要象征。传国玺的观念也影响了建立过元朝的蒙古民族。编年史也提及“传国玺”，而在内地文化及清官书等影响下，文本更多地记载了“传国玺”，⑩《金轮千辐》即曰传国玺在秦始皇时“就成了朝廷的标志，大吉之物”，而林丹汗子及遗孀“把圣主的传国玉玺献给了他（皇太极）”，“据说宋朝和明朝未曾得到此大印”，⑪ 这又当是以此反衬蒙元以至清朝的正统性。另外，文本还特意叙述了嘛哈噶拉佛护法神像显灵转向满洲所在的东方，林

① 耶喜巴勒登：《蒙古政教史》，第 33 页。
② 拉喜彭斯克：《水晶珠》，第 363 页。
③ 答理麻固什：《金轮千辐》，第 118 页。
④ 耶喜巴勒登：《蒙古政教史》，第 21 页。
⑤ 张光耀：《清代边疆族群的“国家认同”和“中国认同”研究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2022 年第 2 期。
⑥ 耶喜巴勒登：《蒙古政教史》，第 21 页。
⑦ 拉喜彭斯克：《水晶珠》，第 367 页。
⑧ 耶喜巴勒登：《蒙古政教史》，第 21 页。
⑨ 答理麻固什：《蒙古青史译注稿》，谢再善译注，西北民族学院研究室，1980 年，第 73、75 页。
⑩ 秦传国玺很早就失传，且其铭文为“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与皇太极所获“传国玺”的铭文不同。
⑪ 答理麻固什：《金轮千辐》，第 140 页。

丹汗子与遗孀亦献护法神像（实非其所献——引者注），清与之联姻、封额哲为王等事。[①]《蒙古政教史》则曰“自此蒙、满融为一体”。[②] 文本对“布尔尼之变”又基本持否定态度，《金轮千辐》即说布尔尼“随着命中注定的厄运，逆着圣祖浩荡的洪福，不享受安乐幸福，不安心统驭臣下……起兵反叛”。[③] 相关书写也表明了文本对清朝正统性认同的显著化。

文本对察哈尔之外的蒙古部落与清朝关系史的书写，也反映了对清朝正统性的认同。比如《水晶珠》记载了漠南蒙古诸部王公及其归属清朝的详细经过，并曰“子子孙孙沐浴大清圣主的仁政”。[④] 文本也记载了漠北等蒙古部落为清廷的效力，[⑤] 以及清朝对漠西等“叛乱”蒙古的征讨。[⑥] 这些也反映了它们的“清朝正统”史观。

与编年史相较，文本对清代蒙古民族史的书写也有很大变化。其相关记录增加很多，且除了记载达延汗后裔，也更多地载录了清代拖雷以外的成吉思汗诸子后裔、“黄金家族”旁系、西蒙古贵族及东蒙古异姓贵族之世系与清朝赐予的爵位等。又是按照清朝盟旗制度下的各个部落依次叙述之。其史源则包括清官修的《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等。

对后金—清朝君主及清廷的历史书写，更为直接地反映了文本对清朝正统性的认同。对于后金—清朝的君主，编年史至多只是简略、含糊地称颂一下，含有“不得不”被动“表示”之意味。与编年史不同，文本对后金—清朝的君主及清廷多加记载，且基本都直接、明白，甚至显得夸张地颂扬清帝，感恩清廷对蒙古的厚恩。比如《金轮千辐》载曰达延汗后裔“受承佛祖与上天之命降生的圣主太祖太宗可汗的恩惠……蒙古各贵族顺从了朝廷，安详平和地生活在政教合一的盛世”。[⑦] 编年史提出“同源论”，主要持“佛授汗权”观；文本则主要持“天授汗权”观，并称清帝为转轮王等，[⑧] 某种意义上，是把“佛授汗权”让渡给了清朝统治者。

此外，文本还有了“大一统”理念。如前文论及，《蒙古政教史》把北元大汗写成是仅统治蒙古等地区的“小汗”。很多文本还明确地指出蒙古自林丹汗而亡国。[⑨]“转轮王”具有普世性，且本当统治世间广大地域，文本所叙之“转轮王”亦当已融入了“大一统”思想。而这些又均反映了文本对清朝这一大一统王朝的认同，其相关书写也一并反映出了“中国认同”——认同清朝，并认为清朝是内地正统王朝，同时即认同中国。《蒙古政教史》还称：“往昔，蒙古大多为汉皇帝之属下”。[⑩] 兹不展开论述。

六、结语

文本的蒙古史书写与编年史相较，既有赓续，又有很大变化。其核心史观依然是正统史观。随着清朝对蒙古统治的加强，满蒙关系更为密切，以及蒙古内地化程度加深，文本侧重表述更为宽泛的“黄金家族正统”史观，而非坚守“成吉思汗—忽必烈统系正统”史观；在汗权来源上又由以“佛授汗权”观为主转回到以“汗权天授”观为主。文本还明确表达了对清朝正统性及大一统国家的认同，因为该时蒙古贵族与清廷的关系更为密切，利益更为一致，所以建构清

① 固始噶居巴·洛桑泽培：《蒙古佛教史》，第 20−21 页。
② 耶喜巴勒登：《蒙古政教史》，第 22 页。
③ 答理麻固什：《金轮千辐》，第 147 页。
④ 拉喜彭斯克：《水晶珠》，第 404 页。
⑤ 拉喜彭斯克：《水晶珠》，第 387 页，载漠北赛因诺颜部贵族“色棱为国效力”。
⑥ 耶喜巴勒登：《蒙古政教史》，第 31 页，称“乾隆皇帝遣汉、蒙大军擒拿达瓦齐”。
⑦ 答理麻固什：《金轮千辐》，第 145−146 页。
⑧ 答理麻固什：《金轮千辐》，第 140 页。
⑨ 耶喜巴勒登：《蒙古政教史》，第 58 页。
⑩ 耶喜巴勒登：《蒙古政教史》，第 14 页。

朝的正统性与塑造蒙古统治阶层统辖其部众的合法性也更具同构性。同时，文本还更明显地表现出了“蒙古民族共同体”意识。其主题依然包括汗统神圣、汗权至上及政教二道，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变化——“成吉思汗—忽必烈统系正统”乃至“黄金家族正统”史观受到冲击，“政教二道”观总体弱化，此外，在对清朝正统性的认同显著增强的情况下，满蒙关系成了新主题。在主题与内地历史编纂学等影响下，文本的体裁呈现多样化，虽然编年体仍是主体，但它们在编纂上更趋完善、灵活。编年史的“正统”大汗与“他者”二元对立的叙事模式在此时虽存在，但已非十分显著，“谗言”与“复仇”的情节模式则得到较多保留。编年史的叙事特征在文本里也得到了保留，但总体上呈弱化之势——其叙事的神话色彩削减，更显质朴和理性，也更为客观。而以上这些则又显著地反映了清代满蒙关系与统一多民族国家在 18—19 世纪的长足发展。

References

Bao Wenhan eds..“Meng wen li shi wen xian gai shu” (Overview of Mongolian historical documents). Hohhot: Neimenggu renmin chubanshe, 1994.

Boyinhu eds.. “Meng gu xue bai ke qvan shu (gu dai shi juan)”, [Encyclopedia of Mongolian studies (Ancient history volume)]. Hohhot: Neimenggu renmin chubanshe, 2007.

Lin Shixuan. “Qing dai meng gu yu man zhou zheng zhi wen hua”(Political culture of Mongolia and Manchuria in the Qing Dynasty). Taibei: Guoli zhengzhidaxue lishi xuexi chuban, 2009.

Liu Xiaomeng, and Ding yizhuang. *Sa man jiao yu dong bei min zu*(Shamanism and Northeast Nationalities). Chang chun: Jilin jiaoyu chubanshe, 1990.

Sh.Bira. “Meng gu shi xue shi” (History of Mongolian historiography*)*, translated by Chen Hongfa, Shang hai: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2015.

Xidurgu. “17 shi ji meng gu bian nian shi yu meng gu wen shu dang an yan jiu” (Research On the chronicles of 17th century Mongolia and Mongolian documents and archives). Shengyang: Liaoning minzu chubanshe, 2006.

The Historiography of Works on the Mongolian Grasslands of Southern Desert and Northern Desert in the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 Centuries: Focusing on the Orthodox Historical View and Its Changes

ZHANG Guangyao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Qufu Normal University; zgyxz10@126.com)

Abstract: The writing of Mongolian grassland history of the Southern Desert and Northern Desert in the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 centuries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politics of the Qing Dynasty, especially the changes in Manchu-Mongolian relations. Compared with the Mongolian Chronicles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the influence from Tibetan Buddhism and Tibetan historiography was weakened, while the influence from mainland culture and historiography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The “Genghis Khan-Kublai Khan system orthodox” historical view was loosened, and instead, they tend to hold a relatively broad “Golden Family Orthodox” view of history. Both historical views, as well as the Buddhist view of kingship significantly weakened. Its text themes, narratives, genres, and themes. which we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historical outlook, also changed accordingly while chronicling the history. The text clearly affirmed the legitimacy of the Qing Dynasty. Its historical writing and its changes also reflected the continuous strengthening of Mongolian national identity and the in-depth development of a unified multi-ethnic country in the Qing Dynasty.

Keywords: eighteenth to nineteenth centuries, historical works on the Mongolian grasslands in southern and northern Mongolia, historical writing, orthodox historical views, national identity